



经典的批判

—— 西汉文学思想研究

郜积意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智宏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的批判:西汉文学思想研究/郜积意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

ISBN 7-5060-1299-5

I. 经…

II. 郜…

III. 文学思想-研究-中国-西汉时代

IV. I20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9342 号

经 典 的 批 判

JINGDIAN DE PIPAN

西汉文学思想研究

郜积意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9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60-1299-5/B·204 定价:15.00 元

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汉书·董仲舒传》

一种意识形态与一种信仰极为不同，尽管它倾向于发挥与信仰相同的社会学功能。意识形态是人的产物，是有意识的政治意向试图按照它的意图来塑造社会传统的工具。但是，信仰看起来则远离人的世界及其成果；它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更高的、更加广袤的实在境界，而不是走向政治和经济秩序所归属的有限而无常的世界。因而，它给人类生活注入一种精神自由的因素，这种因素可以对人类社会的文化和历史命运，以及对人的内在个人经验产生创造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C. 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page 96

引 言

如果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不单是给我们增加有关文学批评及文学观念发展的基本知识,而且还要对我们现今的文艺学建设有所裨益,那么西汉时期的文学思想将显示出极有价值的一面。那个时候,在经过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许许多多未曾料想到的新问题展现在人们面前。西汉的政治制度从秦朝灭亡的结局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它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与规范?它在寻求恢复战后疲软的经济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它如何处理文化理想与现实需要的矛盾?它如何回望与阐述过去的文化传统?那时,人们对于学经的热衷,对于社会政治批判的喜好,对于各种可能分裂王权因素的反感,以及对于与文学相关的种种学说的兴趣,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思考文化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的中心。西汉的文学观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的事,也是文学的事。我们看到,他们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某些观念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影响。因此,对于西汉文学思想的研究,对于那个时候文化问题的思考,都使得我们的研究具有文艺学反思的当代意义。

一如本书副标题所显示的,作者研究的内容是西汉文学思想。不过,在具体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作者选择了与时俗研究不太相同的角度与重心。本书侧重于对当时士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以及共同心态的挖掘。西汉的士人们面对秦朝灭亡的一片废墟,努力寻求种种能够为当朝统治服务的方案。他们认为,一个朝代仅统治十五年的时间,其中必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种差错便是当朝应该避免的;人们应该寻求一种与之相反的政治、文化策略。因此,他们的文章总是力图使人们相信,秦朝统治的严刑酷治终于导致了亡国的命运,秦始皇与二世个人智能上的缺点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而,仁政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多么重要,统治者与民同乐以及注重修身品德才能使王权获得长治久安。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士人们都有一股积极投身当代社会的热情。在新时代的欢呼声中,特别是在统治阶层开通学问与利禄的结合之途后,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一切行为摆脱纯粹个体自我的孤独状态,而使其具有更广大的意义。比如,在他们发展的独具特色的五行学说中,就努力把上述的种种想法纳入到这个框架中,以便为实现真正的文化与政治理想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

但我们看出,他们的努力总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西汉士人在使自己的学术理论转化为社会措施时总是抱着一种急切的心情,这种心情使得他们不能正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与适用范围。比如,许多赋作家总希望把赋作与治国安邦的目标连在一起。因此,在文学理念上,他们的观念是功利主义的。然而,一旦他们的乌托邦性质的理想遭到挫折,他们在创作中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感慨又极具吸引力。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仅存于西汉这个时代,在其他朝代,许多士人也同样面临着这种文学与

政治社会理想的矛盾。

因此,本书希望把西汉文学思想作为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范例来加以研究。这一研究的目标是,试图揭示出与我们现今的文学观念相应的种种血缘关系。尽管这种血缘关系在本书的阐述中得不到历时性的考察,但希望读者会悟到其中的关联与历史的启示。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常常远离自己的家园,常常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而疲于奔波。而在西汉,当时的人们从不把文学当作有自足存在理由的东西,他们借助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思想与权力的关系,文化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我希望,本书的写作是一种试验,尝试着把西汉文学思想的缺陷、贡献,它的内在矛盾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勾勒出来。

所以,读者可能会原谅我以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阐释西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我觉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正好能够给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以适当的评价。关于这点,现在恐怕是一种共识,无人提出异议。还有,我们目前对于西汉文学思想的研究一直以人物为纲,辅之以几部代表著作(如《毛诗序》等),但很难让人觉察出其中内在的文化逻辑,历史在那样的描述中经常显得支离破碎。即使现在人们强调应当考虑经学的影响,但这种认识在具体的操作中却显得极单薄。人们会问,经学是怎样影响文学的?通过什么途径?其具体后果又怎样?这些问题当然不能靠个别的人物及作品评论来解决。尤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所提供的历史深度意蕴以及人们为寻求其答案所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常被忽略不计。这点正是本书努力做到的。作者希望通过对文化境遇和文化心理的发掘来探讨当时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如何在新的王

权统治下调整自己的姿态,目的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视角,把经学和文学相互矛盾纠缠中文学观念的“变形”理路揭示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汉的文学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汉的经学、西汉的文化氛围乃至西汉士人的内心世界。笔者期待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能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找到一份历史的参照,乃至一份共鸣的情愫。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作者把目光主要集中在西汉文学思想的四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汉赋创作,乐府活动。通过这四个方面,作者把相应的人物、典籍、事件纳入到互为关联、互相发明的专题性叙述框架中,并且致力于分析与之相关的文化政策与富有代表性的言论。作者在叙述西汉的《诗经》研究时,追溯了先秦的《诗经》研究传统,以期辨明西汉“经典意识”的形成对于《诗经》研究以及相关的文学观念的影响——都是在“经”的指导下提出的。在叙述西汉的《楚辞》研究时,努力考察之后的《楚辞》学源流,以期辨明那个时代特定的“命”之观念对于《楚辞》及屈原研究的某种制约关系。总之,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如何与意识形态的建立统一起来,如何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力量,文学在那个时候就如何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这些都是本书努力加以详细叙述的。

尽管做了种种努力,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我还是遗漏了许多方面,比如,汉代阴阳五行学说,西汉的盐铁会议等。这一方面由于这些事件与文学的直接关联并不明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作者也认为这些事件与书中所讲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以及本书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我对《礼记·乐记》也没有作评论,这是因为汉初的儒家思想在本书中已有讲述,同时它在后来的诗教、乐教理论发展过程中已被整合、转化。对于这些遗

漏,我希望在另外的场合加以弥补。

总之,西汉士人为了寻求新时代的救世良方所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在我们今天还远未得到解决,我们迄今为止还未建立一种文化与社会平衡关系。在某个时期内,这种平衡还曾被打得粉碎而造成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后果。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我们不仅要分析西汉时期的文学思想,更要反思它所遗留下来的影响。这是本书取名“经典的批判”之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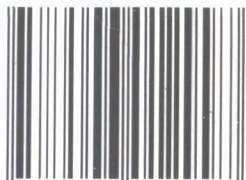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给予了严格的指导与耐心的关怀,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要写成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在本书的许多具体问题上给予了指正。孙先生以北京大学赋予他的学术见解与涵养常常指正我观点上的偏颇与叙述的缺陷,我从他那里学到的远不止于本书所涉及的范围。福建师范大学的王光明教授对于本书的每一章都写出书面的批改意见,即使他不是古典研究专家,但他的反应与感觉有时比一个专业研究者来得更为可贵。他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我指导,而且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鼓励我继续下去。在他身上,我看到作为一位老师的可贵以及一种精神的力量。此外,北京大学的张少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蔡钟翔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程正民教授、李壮鹰教授、罗钢教授均对本书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于他们无私的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对胡鸣师兄以及与我一起生活在 23 楼的许多朋友们表示感谢,对东方出版社的严平先生及刘智宏小姐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是无法面世的。



责任编辑 刘智宏
封面设计 曹 春
版式设计 程凤琴

ISBN 7-5060-1299-5



9 787506 012997 >

ISBN 7-5060-1299-5/B · 204 定价: 15.00元

目 录

1	引言
1	第1章 导论:外倾与内省 ——西汉文学思想的“结”
2	一、经典意识的形成
9	二、变化的迹象
13	三、文士与社会
21	四、文学的变形
28	五、反对的声音
35	第2章 寻求新的意识形态 ——汉初六十年的文化思想
36	一、秦朝的“以吏为师”
44	二、汉人的政治期待
50	三、汉初的文化政策
59	四、学问的综合倾向
64	五、文学理论的作用

72	第3章 文化权威·道德权威·政治权威
	——汉武帝与意识形态的建设
73	一、元光元年三问策
83	二、为博士置弟子员
89	三、博士职能之转变
98	四、循吏：文化、道德、政治三合一的代表
111	第4章 一致性的寻求
	——官学、私学、小学的共同目标
111	一、官学的权力
121	二、私学的呼应
129	三、小学的倾向
137	第5章 《诗经》是诗吗
	——先秦的《诗经》研究
138	一、早期的《诗》观念：礼、乐、志
144	二、“兴、观、群、怨”及其他观念
150	三、“辞、文、意”及其他观念

155	四、《诗》、礼之分野
162	第6章 《诗经》不是诗
	——西汉的《诗经》研究
165	一、“美刺”观念的重新崛起
171	二、“四始”的观念
176	三、“五际、六情”的观念
180	四、研究的启示
185	第7章 一种新的阐释成规
	——西汉的《楚辞》研究
186	一、意图的断定
194	二、意图与意义
200	三、汉人的意图
209	第8章 赋的结构
	——“讽谏说”的文化逻辑
209	一、赋的“讽谏”说
211	二、逻辑的论证

213	三、修辞和说服
217	四、他者的结构
219	五、“正”者的力量
224	六、隐藏的他者
229	第9章 西汉经学与通俗文化
	——雅乐与俗乐的互动关系考察
230	一、初衷与职能
233	二、雅俗的混合
237	三、乐教的失败
244	四、俗乐的审视
251	五、另外的问题
254	结束语
258	人名、书名索引
273	主要参考书目

第 1 章

导论：外倾与内省

——西汉文学思想的“结”

或许是由于西汉这个时代的特定性质决定了我们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总是处于“边缘”的位置。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很难与我们现今意义上的文学概念相比拟，比如，那时的人们在谈到“文学”一词时，经常是指学术，特别是指经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今认为是属于文学文本的，在西汉却被当做非文学文本，比如，关于《诗经》的看法。这种情形使得我们的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对象研究。我们必须回复到西汉，以历史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他们所认为的文学与非文学作品。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西汉文学思想的研究还必须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但这种结合不单是为了客观事实上的考虑。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文学思想的研究从来就不能与学术或者说经学分离开来。西汉是如此，其他朝代也是如此。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探讨西汉文学思想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在西汉，《诗经》可以成为占卜吉凶的工具，可以成为谏书，而在后代的发展中却再也看不到这种例子？为什么赋的发展到那么发达的地

步,而在后代的演变过程中,却徒具一个僵化的模式?为什么汉人那么喜欢模仿别人的作品?因此,即使是考察文学思想和学术的相互作用,也应当把重点放在西汉这个时代的特别之处,即它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结”,才使得它和前后时代的文学思想区别开来?这应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所在。

一、经典意识的形成

西汉经典意识的形成是我们理解文学思想的首要前提。西汉经学之所以取得独尊地位,官方政策与利禄之途的结合固然是一方面,但在人们心中树立经典意识应当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有了经典意识,整个社会才有统一的思想基础,经学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影晌才会达到全面而深入的效果。人们信仰经典,尊崇经典,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遵照经典的指示。对文学的看法也是如此。因此,考察经典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对于理解西汉文学思想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的考察就从语义的分析开始。

从语义学的观点看,“经”的原始意义是与帛织相关的。《说文解字·卷十三》云:“经,织从丝也。”又“织”字云:“织,作布帛之总名也。”段玉裁注谓:“布者麻缕所成,帛者丝所成,作之皆谓之织……经与纬相成谓之织。”而《说文解字》解“纬”曰:“纬,织衡丝也。”即“经”和“纬”分别表示竖丝和横丝的意思。段玉裁注曰:“今云织衡丝者对上文织从丝为言,故言丝以见缕,经在轴,纬在杼。木部曰:‘杼,机之持纬者也。’引申为凡交会之称,汉人左右《六经》之书

谓之秘纬。”^①

“经”表示丝织的原始意义或者以竖丝、横丝表示“经纬”的原始意义的用法在周代已不多见。《诗经》中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经始勿亟”等等说法,但和这些意义都很不同。现存先秦古籍使用“经”或“经纬”的意义与上述的意义已经不合,或者说是上述本义的引申。以“经纬”而论,《考工记·匠人》有“九经九纬”说,疏云:“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周礼·龟人》疏也作同解,^②显然是以丝织的方向引申为东西南北方位了。

春秋战国时,“经”的意义中最为常见的当为“常”、“法”诸义,^③这些显然是后来引申之义。在《论语》中,只有一次使用到“经”,但与常、法的意义并无瓜葛。^④在《孟子》中,除了三次引用《诗经》的句子有“经”字外,其余七次用到“经”的,有四次是“经界”连用,与常、法无涉。按照赵岐的注解:“经亦界也。必先正其经界,勿侵邻国。”余下三次,表示“常”的有二处,即“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⑤而最后一处的意义则指“行”。^⑥

“经”表示“常”、“法”的意义与西汉经典应该说有相通之处。经典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它揭示了事物的普遍规律,一是它的意义是被人们所取法。前者即是“常”的特殊意义,后者即是

① 《说文解字注·卷十三》。

② 阮元:《经籍纂诂·卷二十四》。

③ 同上。

④ 《论语·宪问篇》云:“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⑤ 《孟子·尽心下》。

⑥ 《孟子·尽心下》云:“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

“法”的意义。孔子对于“经”的看法并没有像后来儒者那样的见解，孟子的见解也只是初露萌芽。真正把“经”当做经典，当做《诗》、《书》代称是从荀子开始的。在《荀子》中，“经”的使用共16次，意义也相当广泛。《荀子·劝学篇》第一次以“经”指称《诗》、《书》：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按照杨倞的注解，“经”是指《诗》、《书》，但荀子在此把《诗》、《书》和《礼》相对，似乎认为“经”与“礼”在层次上有区别。不过，在《荀子·大略篇》中，他又把“礼”直接称经而以“礼经”连用。^①

荀子虽然以“经”来指称经书——即汉儒所谓的《五经》，但他并没有把“经”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因为他对于这些经书是抱着不太相信的态度，只是把这些经书作为古代典籍来看待，所以有“《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对经的看法并没有像汉人那样与圣人联系起来。因为在汉人的观念里，经是圣人体悟天道的产物，所以是神圣的、崇高的，是令人仰慕的。

这种情形表明先秦时经典意识并未产生，人们对待传统经典的态度还有分歧。比如，同样是儒家学说，荀子就批评孟子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

① 《大略篇》有“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